

为了忘却的纪念

——北大校长蔡元培

萧夏林
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四月·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了忘却的纪念——北大校长蔡元培/萧夏林编.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5

ISBN 7-80127-471-7

I. 为… II. 萧… III. 蔡元培—纪念文集 IV. K82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1131 号

责任编辑:陈 含

封面设计:许 鑫

为了忘却的纪念

——北大校长蔡元培

萧夏林 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2号 邮编:10005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8 印张 420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127-417-7/G·203 定价:27.00 元

谢 冕

遥远的怀念

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的那个年代，已成了北大永远值得骄傲的记忆。蔡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方针，无声地垂训于此后的岁岁年年，它是北大永远的精神财富。这所最高学府不论经历了怎样的世变沧桑，蔡先生倡导的思想精神，使北大师生始终沐浴在那广纳百川的浩瀚大气之中。它已成为这里的精神遗传，在时间的长河中恒远地绵延。

学校是一个不断更新的、流动的社会。一批学生进校了，一批学生又毕业离校了。人更换了一批又一批，而那种精神却一代又一代地留传了下来。不论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北大学生的那种精英意识，总是驱动着他们做推动社会前进的先驱者。这种思想的确立，受惠于蔡元培先生。

蔡先生主事北大之初，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十六字的深远意义，自不限于指出了北大的办校方向，更是一种人生境界的启迪，无疑是一种大气度、大胸襟展现。其影响不仅在于开拓了北大人的学术视野，更启示并陶冶了北大人的立身处世的精神和姿态。北大“多事”，不时地总有惊人的事件发生。北大人的思考和呼喊很有名，却多半不为—己的得失，多半总涉及社会进步、国事安危这样一些大題

目。人在书斋，万家忧乐涌上心间，读书而不忘世事，这正是北大人的通常心态。

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初，虽曰它是去科举而兴新学，但仍有诸多陋习，如学生称“老爷”即是一例，读书为做官的思想也很普遍。蔡先生上任之初的那些举措，无疑给北大带来了新气象。他了解北大当年的积习，明知困难甚多，决心迎难而上。“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思想”，他到任后的第一个讲演，便是讲：“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认为要改变学生的思想，须以引进学有专长的教授为第一步。

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其要义不在复古而在推进新学。他尤为重视聘用教授中具有新思想的那些人。他首先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便是极有魄力的第一步。他也极为看重胡适，认为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胡一回国就被聘为教授。陈独秀、胡适以《新青年》为阵地倡导文学革命，影响了北大也影响了全国。北大由是一扫旧式文人的积习，变而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蔡先生从引进人才入手，一棋定局，彻底改变了北大的风气，并影响了全国学界。

蔡元培先生本身是位学者，但蔡先生的个人魅力、以及他在中国文化学术界的地位，却首先在于他是一位领导潮流的人物。中国不乏纯粹的学者，那些饱学之士以前赴后继的努力，创造了中国学术的辉煌。但中国缺乏蔡先生这样的学界领袖。他的决策和行动的后果，也决非是个人性的，其影响也决非是暂时性的。这种人，如蔡先生者，他的影响足以改变一个时代的风尚。

蔡元培先生出身旧学，他儒学功底很深。幼时曾在叔父铭恩公的指导下读经史小学等典籍。在叔父的影响下，蔡元培先生打下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稳固根基。十三岁时，蔡先生受业于经学名

宿,对宋明理学有很深的造诣。1892年,进士出身的蔡元培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仅从如上所述,作为中国旧式知识分子,蔡元培先生的成就已是相当卓越的了。但蔡先生却是不同凡响,他并不以此为自己的学术终点。他敢于从零出发,迎向二十世纪的学术新潮。

1898年的变法维新,他站在时代的前列。也就是这一年,他开始学习日文。为了吸收西洋文化,他到世界各国考察。1907年抵德国,四十一岁开始学习德文。次年,入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文学、人类学、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隔数年,复又作为期三年的学术游历。这一切,决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时,他能坚定地站在新文化运动的一边,而且成为那场文化革命的重镇。

蔡先生生当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正是新旧、东西诸种文化猝然相遇的时刻,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变的时刻。蔡先生生当此时,既不固守,又吸纳新知,而在这种激烈的交汇、冲撞中完成了由旧而新的学术转型,他本人也在这种转型中成为了中国知识界、教育界、文化界、思想界的一面旗帜。

蔡元培先生垂范于我们这些后人的,是他并不充满传奇色彩的、伟大而坚定的人生,是他的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宽广的胸襟,是他绝不墨守成规的、勇于革旧图新的开创精神。北京大学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怀着景仰的心情永远怀念他们的老校长。他们在校园美丽的一角他的铜象周围,为他植了常青的乔木、耐寒的雪松。

1998年4月20日于北京大学

钱理群

校园风景中的永恒

中国有所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有个未名湖。

未名湖畔有尊蔡元培校长的铜像。

——这都是中国风景中的永恒，校园风景中的永恒。

蔡元培先生的铜像是文革结束以后第一批北大学生自动发起建成的，是北大人用自己的心垒成的。

北大即将迎来自己的百周年校庆，北大人首先想起的，就是老校长。

于是，纽约校友集会郑重通过决议，建议将先生暂居香港的陵墓迁回北大；也有校友建议将在北大红楼的孑民纪念室定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

这一切自然不会得到回应。就连北大在校师生将自己写的纪念蔡先生的文章寄给某大报，也被退回，理由是宣传蔡元培必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但民间的纪念是不用批准的。心的纪念是不受批准与否的限制的。

而这建立在民间的心的丰碑，才是真正不朽的。

蔡先生也无愧于这样的民间纪念。因为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大转折：从庙堂走向民间，走向自身，正是从蔡先生对北大的改造开始的。

在此之前，无论是 19 世纪中叶以后的洋务运动，戊戌政变，还是本世纪的辛亥革命，都是企图依靠国家的强权政治，或寄希望于政治强权人物，实行社会总动员与高度的组织化，以实现民族振兴，赶上西方先进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主义”的思潮下，知识分子自愿牺牲个体的精神自由，而把自己置于依附于国家(或个人)的强权政治的地位，也就依然走不出鲁迅所说的充当官的帮忙、帮闲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老路。结果出现了袁世凯复辟——在中国，任何强权统治都必然导致封建性的复辟。

于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了新的觉醒：陈独秀率先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怒斥当局“滥用国家威权，敛钱杀人”，指出“人民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而为野心之君……所利用”，“爱国适以误国”，同时提出救国之道即在启发民众之“自觉心”。蔡先生也这样告诫国人：“当断绝政治上之迷信”，“认定教育可以救世”。因此，当 1916 年 12 月蔡先生于“大风雪中”来到北京，就任北大校长，登高一呼，很短的时间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一批影响一个世纪的民族精英聚集于北大，这正是意味着，知识分子目光由国家转向民间，由强权政治家转向自身，由依附权势转向依靠知识(科学、理性)的力量，通过思想启蒙，唤起国人的自觉，自下而上地进行中国的思想文化、社会变革。而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根本思路、选择的大转变是在蔡元培先生的旗帜下实现的。蔡先生所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其目的正是要为知识分子提供自由而广阔的精神空间，将北大改造成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是蔡先生主持的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新范式：这是一批永远处于边缘地位(甚至体制

外)的知识分子,不仅摆脱了官的帮忙、帮闲的传统窠臼,而且也避免落入现代商业社会商的帮忙、帮闲与大众的帮忙、帮闲的陷阱,获得了真正的人格独立与个体精神自由;他们永不停止对彼岸精神理想的追求,对精神(思想,文化,学术)的探索与创造,因此对此岸的现实存在总不满足,永远对现实持批判态度,永远是“新的,改造运动的先锋”——这是鲁迅对“北大校格”的概括,蔡元培先生所培育的“北大精神”,所指的就是北大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提供的这样一种独立的,自由的,批判的,创造的精神规范。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结晶,不仅是北大,而且是整个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意义与价值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

蔡先生的理想是“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他首先通过对北大的改造,创造了新的北大精神,提出了新的世界观,新的社会与文化理想,建立了新的道德伦理,又支持师生创办《新青年》、《新潮》杂志,通过现代传播媒体,影响整个社会,形成社会文化新思潮,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新文化运动。而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则进一步把由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的变革推向全国的政治、社会的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爱国学生运动又反过来极大地提高了北京大学的社会声誉与影响。正是蔡先生领导与支持的一校(北京大学)二刊(《新青年》、《新潮》)一时成为时代思想、文化、学术,以至社会、政治的中心。这是本世纪唯一的一次:民间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独立发动的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凭借知识自身的力量,成为时代的主导,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历史的进程。影响所及,直到今天(世纪末)北大尽管已不再成为时代、社会的中心(这是必然的),但在国人心目中,仍然是一方“精神的圣地。”

北大教授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与学生发动的学生运动,固然有各自的领袖人物,如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胡适,五四学生运

动中的罗家伦、傅斯年等；但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北大蔡先生主持下的短暂几年间，之所以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成为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除了当时的北洋中央政府相对软弱无力这一客观条件外，蔡先生个人的人格力量，威望，影响，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蔡先生既是前清翰林，又是革命元老，既是国民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又留学德国，在国内外教育界与学术界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论学问与道德人格，于“旧”于“新”，两方面都达到了极致，臻于完美而无可挑剔——他写得一手连复古派也望尘莫及的古奥的“怪八股”，又深谙西方哲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他至仁至义至孝，被世人视为“真儒”、“真君子”，又深得“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思想的真谛；他性格儒雅平和而刚毅有决断，既如春风化雨又内含奇气，“是真虎乃有风”。在中国的新旧交替的历史转近时期，正是需要蔡先生这样的“承先启后”的人物，他的能够同时为新旧两派所接受的特殊地位，使得他在历史转折的开端时期空前尖锐的新与旧两派的斗争中，发挥着独特的、他人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正像许多研究者所谈到的，他对北大师生中的新派（特别是新派中的领袖陈独秀）支持、保护，使他们在北大“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的中国的新机运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这里，还要指出另一面，即是蔡先生在大力支持新派的同时，对新派的某些难免的过激方面，也有所制约，在这个意义上，他也保护了处在被猛烈攻击中的旧派，他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本身即含有让新、旧两派在自由竞争中发展，从而保持思想文化发展中的“生态平衡”的意思。这使我想起了40年代朱自清先生逝世后，沈从文的一个评论。他说，在大学里的每一个有成就的教授都是偏至的，即把他自己的学术选择推向极端，这才能形成并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个性，而不能搞折

衷，一折衷就平庸了；但作为系主任或校长，就必须宽容，折衷，这样才能让同一个系（学校）里不同个性、不同学派都得到发展的机会，同时又相互制约，达到学术平衡、健全的发展。这样的“个体上的偏至、任性自由与整体上的平衡、制约”，正是一种理想的学术境界。以此观点看蔡先生当年在北大所起的作用，他不仅支持、保护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爱国学生运动，而且也有力地促成了运动的健全的发展。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没有蔡元培，没有蔡校长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学生运动，没有以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变革”。——蔡先生正是以这样的形象，这样的作用与地位，融入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教育史、北京大学校史之中，并化作“永恒”的。

但每回面对校园里蔡元培先生的铜像，我总要想起“高处不胜寒”这句古诗，在我的感觉中，蔡先生是孤独的。

校庆期间由北大校友、师生创作、演出的话剧《蔡元培》里，有一句台词：“人人都尊崇我蔡元培，可又有谁真正与我同道啊！”有人认为这会贬低蔡先生的形象，把他写消沉了。其实“孤独”几乎是所有先驱者的共同命运；如实反映这类思想超前造成的不被理解的精神痛苦，以及如何从这样的痛苦中挣扎出来，坚定不移地走自己选定的道路，这才是内在地（而不是表面的）写出了蔡先生的精神与人格力量。

且不说别的，单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蔡先生“兼容并包”的思想，要真正被理解就很不容易。曾有人指责这是“搞调和”，其实蔡先生有自己的鲜明立场：他总是站在受压抑、无权势的弱者这一边，五四时期主张变革的“新派”（包括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处于不被承认的地位，因此，蔡先生的“兼容并包”首先要保护的正是新思潮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为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的改革开辟

道路的,并非一味的折衷、调和。但蔡先生同时反对不加分析地对旧文化、守旧派文人受取一律否定的极端态度。他心中也有一条明确的线:当旧派试图借助政治、军事强权的力量来消灭学术上的异己(新派),如林琴南那样打上门来,他是要不顾个人安危,坚决抗击的;但如果仅仅是在课堂上坚持自己选定的保守性的学术立场,如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他也是要坚决保护他们的学术自由权利的。这是与陈独秀等“必不容反对者讨论之余地,绝不容他人匡正”的极端立场是有区别的。这样,蔡先生要贯彻他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既要为新思想、新文化开路,又要保留旧的传统文化”,就必然要受到“绝不允许对方存在”的新、旧两派的巨大压力,并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直到今天(世纪末)人们才终于了解,蔡先生所反对的是将新、旧对立绝对化,“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思维,他主张的是学术上的不同派别(包括新派与旧派)在自由竞争中的多元发展。这就是说,二元对立的独断论一天不破除,蔡先生的“兼容并包”的思想就不会被理解与接受。事实上也正是如此,80年代末以来,如何看待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今天中国的思想、文化、教育,具体说,在今天的北京大学,还需不需要贯彻“兼容并包”的方针,在中国的思想、文化、教育界与北京大学内部一直是存在着争论的。有的人只承认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甚至只限制在保护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这一点上,而认为“兼容并包”今天已失去了意义,再要坚持,就会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保护伞”。这种看似吓人的“过时论”背后,正是隐藏着一个专制主义的独断论的阴影,这是谁都看得清楚的。

就是对蔡先生所开创的北大精神、北大传统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这本是正常的,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立场、角度,去认识历史,阐释传统的。出现分歧,不同意见之间展开论辩,是不可避免

的,也是必要的,在我看来,关于北大精神、传统的某些说法就颇值得一议。例如,有人说“北大的传统就是革命的传统”,作为一个抽象的命题,这并不错;但一具体化,一落实,就有了问题。鲁迅早就提醒我们:政治家与文学家(也就是鲁迅说的“真的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的理解(与态度)是不一样的:政治家在革命前,他自己也受到压迫时,是不满现状的,他与文学家(知识分子)一样,都要求革命,鲁迅因此称之为“政治革命家”;但革命成功,掌握了权力的政治家就要“维持现状”,就要把“革命”二字去掉了,而真正的文学家(知识分子)却是永远也不满足于现状的,他还要革命,这就与政治家的权力发生冲突,鲁迅称之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因此,当有人以“革命传统”作为“北大传统”时,就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政治家提倡的一时的“革命”,还是真的知识分子(也即独立的知识分子)所要求的永远的“革命”?鲁迅把北大“校格”定为永远是“新的,改造运动的先锋”,所指的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是必须辨明的。还有人说,北大的传统就是“爱国主义的传统”,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五四学生运动所提出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其爱国主义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但这里同样也存在一个必须辨明的问题:要提倡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在有的人的观念(解释)中,“爱国主义”就是“国家(至上)主义”,要求人民(包括知识分子)无条件的为所谓“国家利益”(实际是国家执政者的利益)牺牲一切;而如前文所说,这样的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国家主义”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所要批判与否定的,鼓吹这样的“爱国主义”恰恰是对五四精神(也即北大精神)的根本背离。还是鲁迅说得好:“满口爱国于实际做奴才并无妨碍”,真正的爱国者、爱蔡先生开创的北大传统者对此必须有所警惕。

这里还包含着一个更加实质性的问题:不仅对国家有“真爱国”与“假爱国”之分,对于北大,对于蔡先生这样的先驱者也有真

爱(尊重)”、“假爱(尊重)”之别。如果口头上喊得震天响:“拥戴”呀,“继承”呀,“发扬”呀,甚至“捍卫”呀,但实际所做却根本违背了先驱者的理想与北大精神的实质,那么,所有的表面文章都不过是“假借大义,窃取美名”的自欺欺人的“表演”。由是,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一方面,我们奉蔡先生为中国现代教育之父,现代科学之父,另一方面,蔡先生的许多重要思想在本世纪从来没有被重视过,更不用说实行了。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提到,蔡先生的教育思想本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他一方面强调“军国民主义”(据蔡先生解释,相当于“体育”)、“实利主义”(相当于“智育”)、“道德主义”(相当于“德育”)教育,认为这是现象世界的,服从于国家政治需要的教育;但他同时强调超越于现实国家政治的,超越于现象世界的“实体世界”的形而上的“世界观教育”,以及作为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桥梁的“美育”教育,以便建立具有终极关怀、终极价值意义的理想(信仰,信念),陶冶情操,养成个体精神自由、独立的理想人格,最大限度地唤起人的内在的想象力与创造精神。在蔡先生看来,这两个方面的教育都缺一不可,而又以世界观教育为教育的最终目标的。但在世纪初的1912年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先生提出了他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世界观教育”当即被否决,“美育”开始也只同意列入“中小学、师范教育教则”,后经力争,才勉强列入民国教育宗旨之中,但也从未被真正重视。这就是说,蔡先生的教育思想从一开始就被拦腰斩断,本世纪实际实行的德育、智育、体育,以及被狭窄化的美育,是一个“教育的终极目标”缺失的不健全的教育。这样的教育的最大弊端即在它是建立在实利主义基础上的,教育成了为政治与商业的实利目的服务的工具,被教育者也成了有知识的工具,而忽视了对“人”的精神、灵魂的塑造,“人”的根本理想(信仰、信念)、人格、情操的冶铸“人”的潜在智慧、能力、创造力的开掘与发挥。今天的教育,

包括北京大学的教育所存在的许多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这个教育的前提——教育的基本观念:什么是教育,教育的目的、宗旨,出了问题,而这又是与一个世纪以来对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的冷漠,阉割与背离是直接相关的。——人们根本不去仔细研究与思考蔡先生(以及中国其他现代教育的先驱)他们的教育思想的真正价值,而是简单地戴上“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帽子,而不容置疑地加以否定,拒绝继承,正是这样的“左”的思维逻辑使我们吃了大亏,这惨重的教训是不应忘记的。

蔡先生的基本教育思想的命运如此,他的由此引发出的许多重要思想的遭遇也可想而知。例如,蔡先生从主持北大教育的第一天即在就任校长的演说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以后他又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这一思想:“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两科”。他并且进而在高等教育中区分了“专科”与“大学”的两种体制,专科偏向于培养“实用型”人才,而“大学”则以“研究学理,养成人格”为主,他甚至在草拟的《大学令》里明确规定:“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但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他拟定的《大学令》“迄未实行”。——岂止是“大学令”,又岂止是“未实行”,看看今日之中国大学教育,包括今日之北京大学,很多方面简直是背道而驰。文、理学科备受冷落,大学里人文精神的严重失落,早已是掩盖不了的事实。许多大学早已成了“养成资格之所”,学位、职称成了不少师生唯一追求(奋斗)的目标,“做官、致富”早就成为许多学生上大学、家长培养子女上大学的公开的目的,能够向学生“贩卖”点货真价实的“知识”已算是“好教

师”，毫无责任心，贩卖“假货（知识）”的烂竿充数者越来越多。连蔡先生亲自养育的北大在“实利主义”教育的巨大压力下，也越来越向“专科化”的方向发展。各级领导忙于“创收”，忙于接待吃喝，机构的商业化、官僚化的结果是很少有人真正地（而不是形式主义的）关心科研与教学，最后无可避免地导致了科研与教学的大幅度“滑坡”。鲁迅早在 30 年代就已经因为五四时期的战士，爬上了“高位”，反过来对年轻学生行使知识霸权而感慨“五四失精神”；今天，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人们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蔡校长培育的北大，是否再一次地“失精神”？

因此，越是临近北大百周年校庆，我越是不敢走近校园那神圣的一角；作为今日之北大的一个成员，面对蔡校长，面对这一百年的校史，我只感到羞愧与悲凉……

此刻，蔡先生在想什么呢？

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什么也不说……

哦，在校园风景中的永恒！

1998 年 4 月 20 日写毕于燕北园

目 录

序 言

- 遥远的怀念 谢冕
校园风景中的永恒 钱理群

我在北京大学

蔡元培
文 录

入主北大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4
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 7
教育独立议 11
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 14
关于不合作宣言 21
洪水与猛兽 24
辞北大校长职声明 25
致北大学生函 27